

北京图书馆忆旧

吕叔湘

我第一次走进北京图书馆是在1925年，那时候，馆址还在方家胡同，名称是京师图书馆。那一年，我以东南大学学生的身份在北京大学借读。我有一位同乡何迈尘先生在京师图书馆工作，就住在馆里。他常来找我，也带我到他那儿去。这就给了我参观京师图书馆的机会。图书馆的房子是旧式平房，藏书不少，也很有些好书，可惜我当时念的是洋书，对中国古书既不很内行，也不太感兴趣，没有很好利用这个机会。

这位何先生在馆多年，跟我说过好些故事，现在还记得的有两件事。一件事是他说有一位国会议员叫陈垣的差不多天天来图书馆看书，馆里的藏书他几乎都翻过。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援庵先生的名字和有关他的事迹。另一件事，是有一天馆里丢了一部宋版陶渊明集，窃贼是冒北大学生某君的名字，利用图书馆借书还书手续中的一个什么漏洞把它弄走的。后来天津一家旧书店捎来一个口信，说是书在天津，赶快拿多少块钱去赎，如果惊动警察局，书就出洋了。结果还是讲价赎回来的。

北京图书馆是京师图书馆和北海图书馆合并而成，北海图书馆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的钱修建的，就在现在的馆址，开放的时间好象是1926年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“北海图书馆”五个字是梁任公写的。北海图书馆正式开放，我已经回南去了，赶我1931年第二次来北京，已经改名北京图书馆。那时候的馆长是蔡元培，副馆长袁同礼，他们很延揽了些学者在馆中任职，向达、贺昌群、赵万里、王重民、孙楷第、谢国桢都曾先后在馆里工作过。他们替北京图书馆采访有价值的图书，也做些研究工作，写文章在馆刊上发表。我因为认识其中的几位，所以也有机会参观里边的藏书，赵万里引我看他掌管的善本书室，王庸引我看馆藏的旧地图，真是长见识。这些位学者之中，除孙、谢二位之外都已作古人，想起来恍如隔世。

那时候到北京图书馆来看书的人不像现在这么拥挤，阅览室里空位很多。主楼后边有一个不大的食堂，供应工作人员的午餐，也接待一部分读者。这样，看书的

人就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到外面找地方吃饭，而且图书馆食堂在清洁卫生和秩序安静方面都比外面的饭馆好。

有一件事情是我永远不会忘的。那年的九月十八日是北京图书馆组织的善本书展览的第一天，来的人很多。就在参观者中间传来一个消息，说是沈阳的日本兵占领了北大营。就这样开始了中日战争的第一个阶段。

1931年我在北京只住了两个月。第三次到北京已经是解放后的1950年了。就在这一年或者第二年，有一天意外地收到文物局的一个开会通知，座谈北京图书馆的工作计划。后来才知道是向达告诉当时担任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同志，说我懂点图书馆工作，所以约我参加座谈的。开会的地点在北海团城上面，到会的有二十多人，徐特立徐老也来了。当时在文化工作方面很强调普及工作，北京图书馆除开辟儿童阅览室外，还准备办流通图书馆，设在大汽车上，开到一些工厂和建筑工地上去服务。参加座谈的同志意见不一，议论纷纷。后来徐老说话了，他说北京图书馆不是一般的图书馆，它是国家图书馆，是全国最大的参考图书馆，虽然已有相当规模，但是还不够，它应当朝这个方向发展，不应当舍己之田，耘人之田，把应当由地方图书馆承担的任务揽过来。徐老的话获得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。

这些都是三十年、五十年以前的事情了。事隔多年，记忆可能有错误，请读者指正。

一九八二年七月

于大连棒棰岛宾馆